

# 从新近的考古发现看斯基泰人在中西交流中的作用和地位

徐艳芹

(兰州大学,甘肃 兰州 730020)

**摘 要:**从阿尔赞2号王陵、阿拉沟四处竖穴木椁墓、洋海墓地等处的考古发现入手,可以发现公元前10世纪前后,由于全球气候变冷,斯基泰人(Scythians)从南西伯利亚来到吐鲁番盆地。到达吐鲁番盆地之后,洋海地区的斯基泰人可能为了追逐更丰沛的水源来到托克逊河流域,文明继续发展,发生了社会的分层和贫富的分化,终于在战国时期产生了国家——车师。在两汉时期的汉匈斗争中,斯基泰人同汉民族之间的民族融合已经开始。450年,车师为柔然所灭,斯基泰人融入其他民族(包括汉族)之中。吐鲁番盆地的斯基泰人在中西文明交流中发挥着中介的作用,其本身文明的高度发展也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中西文明交流的水平。华夏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很可能受益于欧亚草原同内陆之间的文化接触和文化交流。

**关键词:**斯基泰人;南西伯利亚;车师;中西交通;华夏文明起源

**中图分类号:**K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670(2015)06-0053-06

斯基泰人(Scythians)也译为斯基台人、西古提人(Skutai)、西徐亚人或赛西亚人<sup>①</sup>。在古代中亚与古代新疆历史上,斯基泰人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早在张骞通西域之前,古代中亚与新疆地区的先民已经开始了频繁而深刻的文化交流。生活在欧亚大陆中间的斯基泰人不仅游走于里海北岸、河中地区、帕米尔高原、南西伯利亚地区、天山南北,甚至到达了今天的吐鲁番盆地,而且他们的生活年代远远早于张骞通西域,所以在张骞通西域之前的漫长历史时期,斯基泰人实际上是早期中西交流的实践者。在早期中西文化交流中,斯基泰人扮演了双重的角色,他们既是早期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侵袭者和劫掠者,又是早期中西方交通的开拓者和两个世界交流的使者。他们在张骞通西域之前,已经生活在欧亚大陆的中间地带,并形成了以今天新疆北部、西部为中心的灿烂文明。

西方学者关于斯基泰人的研究有300多年的历史,

自19世纪以来,斯基泰人一直是内陆欧亚学研究的重大课题。国内学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也已开展了较多的研究。关于斯基泰人在早期中西文明交流中的作用和地位,国内学界的研究成果已经比较丰硕,其研究视野主要投射在斯基泰人与早期中西贸易、斯基泰文化同中国内地的文化互动和文化接触,以及斯基泰人与中国古史研究等领域。2000年以来,俄国考古学者在南西伯利亚地区的阿尔赞、巴泽雷克发现了举世震惊的斯基泰王陵,在这里出土了大量的金饰。我国考古学者则在新疆鄯善发现了洋海古墓,这里同样形成了以斯基泰人为中心的文明,《史记》《汉书》中记载的车师,就是他们的直系后裔。由于相关的考古资料陡然增加,学界对斯基泰人的研究热情更为强烈,出现了很多新的研究成果。本文便以此为基础,尝试重新阐释斯基泰人的活动和文化,以便学界对斯基泰人在早期中西文明交流中的作用有

收稿日期:2015-09-12

作者简介:徐艳芹(1991—),女,山东临沂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敦煌学研究。

<sup>①</sup>如何界定斯基泰人?斯基泰的边界如何确定?在这些问题上,考古学家们至今没有一致的看法。苏联考古学家阿甫杜辛认为,分歧的根源在于看待斯基泰这一术语的角度不同。从地理学角度来看,斯基泰包括多瑙河与顿河之间的草原,有时还包括库班草原地区,这些地区居住着具有斯基泰生活方式,但语言上往往没有亲属关系,有时政治上也各自独立的民族。从另一个角度即民族学角度来看,斯基泰部落应指在起源、语言和政治归属方面均为真正斯基泰式的部落。后一标准目前在考古学上占优势。参见[苏联]阿甫杜辛:《斯基泰文化》,载《考古学参考资料》第6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一般地,学界多认为塞人即萨迦(Saka,又译作塞迦)。关于塞人和斯基泰人的关系问题,学界尚有不同意见。有学者认为,塞种和斯基泰人可能是两个不同的族群。参见陈天机:《大自然与文化:环境、创造和共同演化的故事》,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2、469页。但多数学者认为,《汉书》中出现的塞人、塞种便是斯基泰人。参见王钺、李兰军、张稳刚:《亚欧大陆交流史》,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0-51页;杨希枚:《北海僭耳地望与月氏、匈奴、春秋晋人媿面之俗——有关古鬻鬻民族考的一些补证》,载《台湾》《大陆杂志》,1969年第1期。也有学者认为,斯基泰人的概念更为宽泛,塞人仅是斯基泰人的一支,如赵汝清。参见赵汝清:《从亚洲腹地到欧洲:丝路西段历史研究》,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3页。本文的论述中,是将塞人看作斯基泰人的一支。

新的认识。

### 一、从新近的考古发现看斯基泰人在中国境内的活动

洋海墓群位于我国新疆鄯善县吐峪沟乡洋海夏村、吐鲁番盆地火焰山南荒漠戈壁地带。墓地分三区。一区位于西部,东北—西南向,南部略宽,从南向北逐渐变窄,中部宽 45 米,南北长 350 米,面积 1.575 公顷。

有墓葬 1 000 余座。二区位于一区以东,东北—西南向,呈长方形,长 300 米,宽 80—100 米,面积 2.58 公顷。有墓葬 1 500 余座。三区位于二区以南,南北向,南北长 150 米,东西宽 100 米,面积 1.5 公顷。有墓葬 500 座左右。墓葬均为先挖竖穴,墓口有篷盖物。年代衔接紧密。2003 年对其进行考古发掘,出土大量文物。时间大概从公元前 10 世纪到两汉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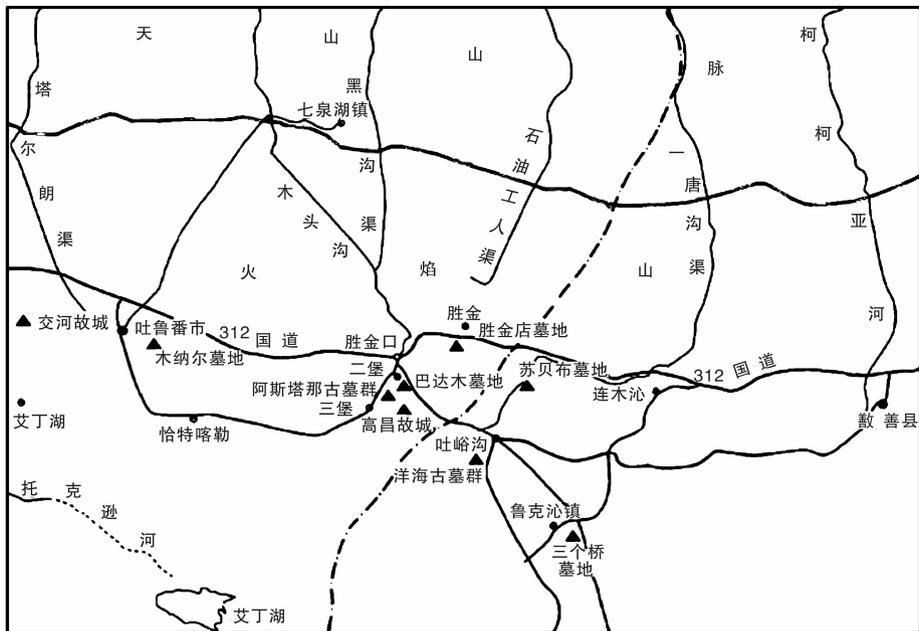


图 1 洋海墓地位置图

据出土物的文化特征判断,洋海墓地是斯基泰人的文化遗存。首先,从出土物的动物纹饰方面来看,洋海墓地出土的动物纹饰在阿尔赞墓地均可见到,尤其是洋海墓地中出土的小木桶上的鹿纹同阿尔赞 2 号王陵并无二致。洋海墓地出土的小木桶(两侧带孔)上的三角纹饰,在阿尔赞 2 号王陵也可见到。其次,从丧葬形制上看,洋海墓地的墓式、葬具、随葬品、文化特征等均与阿尔赞、阿拉沟的斯基泰墓葬相近。洋海墓葬发掘时都是先挖出竖穴,墓口有篷盖物<sup>[1]100</sup>。其中的 IM150 墓葬内填黄色沙土,并夹有土坯、草、骆驼刺等。在距墓口深 0.23 米处有一层用细圆木条搭建的棚木,棚木下有两根粗圆木作横梁,在南北两壁掏洞,将横梁两端插入洞中。阿尔赞 2 号王墓也是竖穴土坑墓,墓室内也用原木构筑棺椁。阿拉

沟出土的四座墓室也均为长方形竖穴<sup>[2]18</sup>。位于苏联阿尔泰山北的巴泽雷克墓地的马鞍中也填充鹿毛,并且也是竖穴墓,甚至连陈尸的尸榻也非常相似。在这个墓地里随葬的弓和弓弦同洋海墓地一样也是故意折断的。这些文化特征与洋海中期的文化相对应。阿尔赞 2 号王墓中发现的斯基泰人文身习俗,在洋海墓地也有发现<sup>[1]147</sup>。其次,从人种学的角度来看,洋海人颅骨形态的综合特征明显倾向于高加索人种系列,其中 2/3 近于古欧洲类型,1/3 近于地中海类型;前二期的居民没有大的变化,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群体。后期虽有蒙古人种因素的明显增加,但不足以改变基本的综合体<sup>[1]147</sup>。综合以上因素,可以判定洋海墓地是斯基泰人文化遗存。



图2



图3



图4

图 2-4 依次为洋海墓地出土小木桶(两侧带孔)、双耳小木桶和俄罗斯阿尔赞墓地出土金鹿、金马



斯基泰人在这一时期活跃在吐鲁番洋海墓地地区,其实同斯基泰人的早期迁徙有关。将洋海墓地、巴泽雷克墓地、阿尔赞墓地等斯基泰人墓地串联起来,即是早期部分斯基泰人大致的迁徙路线:俄罗斯图瓦共和国北境西萨彦岭支脉土兰诺—乌尤克盆地→俄罗斯戈尔诺阿尔泰省巴泽雷克盆地→中国新疆阿勒泰地区→新疆吐鲁番盆地。这种迁移路线透露出早期斯基泰人的活动地域的拓展,那就是部分斯基泰人从南俄罗斯高加索地区进入到中国境内的草原地带。这种迁移和活动地域的改变,可能与欧亚草原东部的气候变化有关。自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世纪左右,挪威雪线一直在降低(雪线降低,表示温度下降;反之,表示温度上升),全球气温在一直变冷。南西伯利亚草原地带冬季本身就已经非常寒冷,这时气候变得更加干冷,对人们和牲畜的生活造成极大的挑战,游牧生活难以维持。新疆地区在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七八世纪前后的气候变化趋势与此相类,却反而因地表水蒸发的减弱而缓解了新疆地区的干旱局面<sup>[3]</sup>。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习性,可能引起斯基泰人的一支南下到达吐鲁番地区。南西伯利亚地区再次变得潮湿是在公元前600年<sup>①</sup>,水土重新变得丰美,则可以解释为何大部分斯基泰人滞留故地,以及南西伯利亚草原地带的斯基泰文化在此前后达到鼎盛。

斯基泰人往鄯善县吐鲁番地区迁徙的路线,还有一种可能。那便是自南西伯利亚南下经由哈萨克斯坦的平原丘陵地带到达吉尔吉斯斯坦的楚河和伊犁河流域,再经由伊犁河河谷来到我国的塔里木盆地。再由塔里木盆地东北口出,进入吐鲁番盆地。其间无大的地理阻隔,是可以实现的一条道路。现在的一些考古发现也说明,在南西伯利亚、伊犁河河谷和吐鲁番地区之间曾经有过人员的流动。1983年,新疆伊犁地区新源县出土了一具铜铸造的斯基泰武士像,铜像高40厘米,呈半跪状。武士头戴高大的宽沿尖顶帽,高鼻窄面、目视前方,神态肃穆,是典型的欧罗巴男子形象。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武士头上向前弯曲的尖顶高帽和手里曾经握着的长矛,这一形象与南西伯利亚巴泽雷克墓出土的武士形象如出一辙。

这一迁徙过程具有重要意义,也对其后的中西文明交流带来巨大的影响。有学者关注到,鄯善县的洋海墓地发现有车师文化遗址<sup>[4]</sup>。此外,阿拉沟地区的出土报告证实,在吐鲁番盆地托克逊河流域也有斯基

泰人的踪迹。1976—1977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原考古队对阿拉沟四处竖穴木椁墓进行考古发掘,出土大量金器和一些青铜器、木器、漆器。出土的方座承兽铜盘,同类器物过去在苏联哈萨克斯坦境内曾有所见<sup>[2][22]</sup>。此即古代斯基泰人的文化遗存。阿拉沟四处竖穴木椁墓的考古学时期系战国到西汉时期,大致相当于洋海晚期。洋海墓地、阿拉沟四处竖穴木椁墓等地的文化特征,也同毗邻的交河故城相近。我们有理由认定,车师国居民主要即斯基泰人的后裔,阿拉沟四处竖穴木椁墓、洋海晚期墓地实际即车师文化遗址。

对车师国的文献记载,辅之以洋海、阿拉沟等地的考古发现,可以呈现出战国至公元前后斯基泰人在吐鲁番盆地活动的历史图景。

当地的人们具有逐水草而居的生存常识,车师国在战国时期出现,很可能与洋海墓地的主人斯基泰人追逐更加丰沛的水源有关。据史书记载,战国时期开始,吐鲁番盆地兴起一个绿洲古国——车师国,车师国的国都即托克逊河流域的交河故城。将洋海墓地和交河故城的地理位置比对后可以发现:洋海墓地北侧即博格达山,这一地区有数条水渠自博格达山发源,流经吐鲁番盆地,成为吐鲁番盆地主要的水源生命线。洋海墓地即位于两条水渠——海沟渠和木头渠交叉形成的水渠附近。交河故城则位于塔尔郎渠出山口的冲积盆地附近。既然洋海墓地的考古学文化延续时间长达1000多年,中间未有中断,车师国则自战国时期出现,之间的数百年时间中很可能发生了人员的流动,而流动的动力则是水源。

当时的车师国虽然人口不多,都城人口6050人,举国也不过12000多人。然而,车师国的军事地位却极为重要。交河故城地跨天山南北,扼守丝绸之路交通要道,是东西方贸易、文化、使节交流与交往的必经之地。秦汉之交,“由于匈奴的兴起,引起民族大迁徙,社会不稳定因素增长,文化开始衰落”<sup>[1][147]</sup>。西汉时期,汉朝同匈奴为争夺西域的控制权,自公元前99年到公元前60年,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连续发生了五次大的战争,历史上称之为“五争车师”。最终,汉朝把匈奴势力驱逐到了天山以北,就是现在博格达山以北地区,控制住了车师地区。车师居于入疆前哨,且处于汉、匈奴两大势力之间,位置重要,为便于控制便将车师一分为八,即车师前国、车师后国和山北六国。山北六国,即博格达山以北的六个小国。

①这是苏联列宁格勒地理所西尼特尼科夫的研究成果,转引自竺可桢:《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载《气象学报》,1962年第51期,第277页。



随着匈奴日逐王率众降汉,吐鲁番盆地的地方政权终于归汉。这一时期斯基泰人和汉人之间的交流融合更加频密。洋海墓地的出土报告中便说:与匈奴兴起同时,“居住在河西走廊西部的族群有的不断向西迁移,这种浪潮从青铜时代早期从没有停止”,然而“后期虽有蒙古人种因素的明显增加,但不足以改变基本的综合体”<sup>[1]147</sup>,车师居民仍以斯基泰人为主,多为欧罗巴人种。

公元 450 年,车师国被柔然所灭,斯基泰人的一支融入柔然民族之中,也有部分斯基泰人融入其他民族之中,包括汉族。2004 年 10 月上旬和 2005 年 10 月上旬,新疆吐鲁番地区交河故城沟西墓地康氏家族墓的出土便说明了这一点。此墓系魏晋时期西迁到吐鲁番的汉人墓地,这些墓大都是斜坡墓道,这是汉族人特有的丧葬习俗。他们都是以姓氏、家族为单元,每个墓园井然有序、界域分明。然而,例外的是其中的 M26。M26 位于康氏家族茱院中北部,地表有椭圆形封土,略高于地表,表面铺有一层砾石块。墓口位于表土下,四隅圆滑,平面呈长方形。南北向剖面口小底大,平底,上口长 2.4 米、宽 1 米,下口宽 0.56 米、距地表深 1.92 米。在墓室口外有残存的模制土坯块,填黄泥土<sup>[5]</sup>。这与阿拉沟四处竖穴木椁墓、洋海墓地的墓表形态极为相似。可以断定也是斯基泰人的文化遗存。在汉族家族墓葬中出现斯基泰人的竖穴墓,很可能说明,部分斯基泰人在魏晋时期已经同西迁的汉人通婚,死后则采用了本民族的固有葬式。

## 二、新近的斯基泰文化遗存中所见中西文明交流痕迹

斯基泰人的早期主要活动地域——南西伯利亚和我国新疆地区在地理和文化上属中亚地区,处于亚欧两大洲交界之地,中西文明交汇之区。因此,斯基泰人的文化遗存便显示出这种中西方文明交流混融的特征。下面主要以洋海墓地的出土物论述这一问题。

洋海墓地出土的一个小木桶呈现出欧洲独有的小花紫草装饰文化的特点。洋海出土物中有一只小木桶,它的桶沿上用洁白晶莹的植物种子粘成装饰三角纹饰。依然保留的 297 颗白色的植物种子呈连续的倒三角在桶口闪烁着瓷样光泽。经过实验鉴定它们是小花紫草的果实,碳-14 测年法测定为 2 550 (±40)年前遗存。这种植物分布于欧洲到中亚的区域。有学者认为,保加利亚的 Gumelnitsa 文化遗址中曾有 600 多颗穿孔的小花紫草果实被当作珠子制成装饰品;在新石器时代意大利北部的湖上桩屋遗址发

现当地居民将紫草果实点缀于纺织品。但这种文化现象在欧亚大陆的欧洲部分出现,在亚洲尚未被发现过。吐鲁番洋海墓地小花紫草果实装饰文化,可能是早在史前时期就从欧亚草原传到了吐鲁番<sup>[6]28-32</sup>。

洋海墓地出土物葡萄藤、竖琴也系自西方传入,洋海地区的斯基泰人同中亚、欧洲地区之间保持了有效的文化互动。洋海墓地出土了一根有 5 个芽节、大约长 115 厘米的葡萄藤。葡萄的原产地在地中海沿岸和小亚细亚,新疆没有葡萄的亲缘种。还有小麦,新疆最早的小麦发现于塔里木盆地的小河墓地<sup>[7]</sup>,它证明早在 4 000 年前原产于地中海的小麦已经进入新疆并渐次进入中原。但是小河的小麦因为没有旁证而无法描述具体的传递路线,洋海的小麦发现为此补上了生动的一环:大约继小河之后的 1 000 年,小麦开始在洋海的土地上播种收获<sup>[6]15-21</sup>。洋海墓地发现的竖琴,则来自于小亚细亚或美索不达米亚。新疆只有两地发现了竖琴,另外一处是且末扎洪鲁克墓地<sup>[1]148</sup>。洋海地区的斯基泰文化可能还影响到南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地区的文化。有学者通过将洋海古墓群出土的塔加尔文化铜戈、南西伯利亚出土的塔加尔文化铜戈和哈萨克斯坦出土铜戈进行比较研究,认为铜镇最早出现于南西伯利亚的塔加尔文化和位于欧亚草原的斯基泰文化<sup>[8]</sup>。斯基泰-塔加尔文化的源头,正是欧亚草原东部的斯基泰文化。

此外,斯基泰人同我国内地族群一直有文化接触和互动。洋海墓地的一些出土物很可能来自中国的内地和东部沿海地区。海贝即贝壳,洋海墓地多有出土。从保存了原使用位置的几座墓葬看,多缝缀在毛编织带上作头饰,个别还握在手中。洋海墓地出土的海贝都属于一个相同的品种,为腹足纲宝螺超科宝螺科的黄宝螺种。黄宝螺是贝壳中形状变化最多的一种,大致壳厚,微扁平,有棱角,壳口窄,唇齿不多,但短而强。壳表底色为淡黄色,壳缘、壳底和齿为白色<sup>[1]113</sup>。分布于热带印度洋、太平洋沿岸,栖息于珊瑚礁附近,以海藻为食。曾经在世界许多地区作为货币<sup>[9]</sup>。据此可以判定,洋海墓地出土的货贝可能来自我国东部沿海或者印度地区。此外,原产于中国内地的黍,在 4 000 年前发现于小河墓地,在洋海墓地中也有发现,可能说明了黍自东向西传播的过程。

云南青铜文化中的部分斯基泰文化遗物(包括当地的仿制品)是由古代欧亚草原游牧民族“塞人”通过澜沧江河谷传入云南的。苏联巴泽雷克墓是重要的斯基泰人墓地,台湾学者陈健文利用其出土材料,认为最迟在战国晚期,中国内地与南西伯利亚之间已有某种程度的文化互动,并且一直持续到汉代,即便

是岭南地区也有巴泽雷克墓的影响踪迹。中介管道可能借由自春秋时期开始便不断从西北朝中原移动的戎族或羌族完成<sup>[10]</sup>。洋海墓地的挖掘则为以上说法提供了更为清晰的脉络。更确切地讲,云南青铜文化中的部分斯基泰文化遗物是由我国新疆境内的斯基泰人(包括后来的车师人)传入,中国内地受到的斯基泰文化的影响,更可能是借由我国境内的斯基泰人推动的,当然也不排除戎族或羌族侧身其间。

部分斯基泰人很可能还曾到过中国的贺兰山麓、陇东地区,这可由贺兰山岩画和甘肃刘坪墓地的出土物窥其大观。斯基泰风格的鹿纹头部高耸、大眼、有耳、有四肢且吻部修长,角形长而弯曲多变化。贺兰山麓的岩画中便有这种斯基泰风格者<sup>①</sup>。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刘坪发现的虎纹、对鸟纹、对龙纹金片,在阿尔赞2号王陵、洋海墓地等墓地都有出土相似的器物<sup>[11]</sup>,它们显然也是斯基泰风格的。根据考古资料,原始先民开辟的草原大道,就是从我国宁夏、内蒙古经过蒙古的赛音、山达市、曼达尔戈壁、鄂尔浑河(哈尔和林)等地到贝加尔湖、叶尼塞河上游和乌兰哈达一带,在这些地方都发现了船底形刮削器、锥形石核、底部带凹档形的三角镞、石片制成的一端刮削器等工具。部分斯基泰人很可能正是从这条草原大道来到贺兰山麓和陇东地区的。而“秦人的部分血统来自于斯基泰人”<sup>[12]</sup>等说法虽有一定道理,但有待新的考古材料佐证。

## 结语

在公元前10世纪前后,由于全球气候变冷,斯基泰人从南西伯利亚来到吐鲁番盆地。其迁徙路线至少有两种可能:(一)俄罗斯图瓦共和国北境西萨彦岭支脉土兰诺-乌尤克盆地→俄罗斯戈尔诺阿尔泰省巴泽雷克盆地→中国新疆阿勒泰地区→新疆吐鲁番盆地。(二)自南西伯利亚南下经由哈萨克斯坦的平原丘陵地带到达吉尔吉斯斯坦的楚河和伊犁河流域,再经由伊犁河河谷来到我国的塔里木盆地。再由塔里木盆地东北口出,进入吐鲁番盆地。到达吐鲁番盆地之后,斯基泰人的生活方式逐渐向定居、半定居转变,青铜器制作有了一定发展,其黄金制作技艺逐渐成熟。此后,洋海地区的斯基泰人可能为了追逐更丰沛的水源来到托克逊河流域,文明继续发展,发生

了社会的分层和贫富的分化,终于在战国时期产生了国家——车师。车师国都交河故城即位于托克逊河流域。

在两汉时期的汉匈斗争中,由于车师军事地位极为重要,汉朝和匈奴围绕车师国展开了五次战争,最终将匈奴势力排斥出吐鲁番盆地。为控制车师国,汉朝将车师国瓦解,一分为八,加以削弱。这一时期,车师国的民族融合已经开始了,洋海晚期的出土物中已经出现了很多汉人器物,蒙古人种的因素有显著增加,应该是河西地区的族群迁徙至此地,而后同斯基泰土著通婚的结果。450年,车师被柔然所灭,斯基泰人融入其他民族中去,包括汉族之中,加入了魏晋时期各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进程。阿拉沟地区的斯基泰文化遗存时期也在战国至西汉时期,发掘的四处竖穴木椁墓是斯基泰上层人物之墓,此地的斯基泰人和车师国的关系有待另文讨论。

吐鲁番盆地的斯基泰人在中西文明交流中扮演了中介的作用,其本身文明的高度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中西文明交流的层次和水平。西方的葡萄、紫草等经由他们传入我国吐鲁番盆地,小麦甚至经由他们渐次传入中原。东方的黍、海贝可能也经由他们传入到了西方世界。在丝绸之路开辟之后,斯基泰人的文化媒介作用可能更为重要。而且,他们同中国内陆的文明一直保持着沟通,甘肃清水县刘坪墓地出土的斯基泰风格金片、贺兰山麓的斯基泰风格岩画便是这种文化沟通的见证。他们还可能曾同秦人祖先结为姻娅,对秦人祖先向东扩张帮助很大。中国境内的其他斯基泰族群在中西交通中的地位和作用,大体与吐鲁番地区的斯基泰人相似。

公元前第一千纪前半期,欧亚草原文化因素在中国北方自西向东都有广阔分布,欧亚草原与内陆之间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交流与融合<sup>②</sup>。更有甚者,有材料表明,至少在2000—3000年前,“西方基因”已经在我国多个地区人群中存在,这些“西方基因”正是经由我国新疆向东流向内地的,这些欧洲人种的人群在汉代之前向东扩展的地理界限大致是在新疆东部和甘肃西部之间<sup>③</sup>。姑且不论这些欧洲人种的人群同古斯基泰人有何种关系,我们仍可以断定:华夏文明的发生和发展间接地受益于欧亚草原与内陆之间的这种文化接触和文化交流。无论在哪个历史时期,华

① 详见《贺兰山岩画的密码:解密斯基泰文化》,中国网2008年10月31日报道, [http://www.china.com.cn/aboutchina/txt/2008-10/31/content\\_16693171.htm](http://www.china.com.cn/aboutchina/txt/2008-10/31/content_16693171.htm)。

② 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探索·发现”栏目纪录片《洋海古墓(七):远去的背影》中有对王睦的采访。参见 <http://tv.cntv.cn/video/C21576/00d26cfe0b1941f6c1979ae793a0170>。

③ 详见张银运,吴秀杰,刘武:《中国西北地区古代人群头骨的欧洲人种特征》,载《人类学学报》,2013年第3期。



夏文明均不是一个文化孤岛,它同其他文明之间一直保持着有效的沟通和交流,古人的交通能力远非今人所能想象。对华夏文明发生、发展的研究,只有跳出民族主义的解释框架,才有可能获得崭新的视野,得出更加客观理性的结论。

#### 附录:

##### 洋海墓地 M21 墓主身份献疑

洋海墓葬 21 号墓中埋葬的是一位大约 40 岁的男子,他的额头上系着一条缀有海贝的彩色毛绦带,头戴羊皮帽。左耳戴一只铜耳环,右耳戴一只金耳环,两个耳环大小相同。脖子上挂着用玛瑙和绿松石串成的项链,穿着色泽颇为鲜艳的毛衣裤,脚穿镶有铜扣的皮靴。右手持一根短木棍,上面螺旋状地缠裹着铜片;左手握着一把木柄青铜斧。腰间挂两个皮袋,里面分别装着一把铜刀和一把铜锥。有学者认为,墓主人的身份是一个地位较高的萨满巫师。羊皮帽便是其神帽。90 号墓葬出土物箜篌则是萨满巫师作法术时弹奏的主要乐器。21 号墓主人左手所握木柄青铜斧则是作法术时驱赶鬼神的法器。萨满巫师怀里抱的木棍,是巫师作法术时使用的神杖。

这一说法有很多问题。首先,洋海墓群中为何未发现贵族或者部落酋长的墓葬?大规模的人群曾在此居住和生活,然而考古报告却告诉我们,洋海墓群的墓主人主要有两类人:男人和女人,或者说民众和巫师,这确实有违常理。其次,所谓“巫师的法器和法帽”出现在二处墓葬之中,而非同时出现于一处墓葬之中,难免有穿凿附会之嫌。再次,21 号墓主人的重要特征:颅骨有开孔,腰间皮袋中的铜刀和铜锥,额上所系缀有海贝的彩色毛绦带等却未得到合理的解释,也令人对部分学者所谓“墓主人系萨满巫师”的结论顿生疑窦。试问,铜刀和铜锥在“巫师”的施法仪式中作何用途呢?颅骨开孔难道是为了上通神灵吗?这种思维颇为奇怪。

实际上,这种穿孔现象在新疆地区的考古发现中屡有发现,多为死后人工所为<sup>[13]</sup>。然而进行这种手术的工具为何,迄无定论。洋海墓地 21 号墓中的出土物恰恰回答了这一难题。21 号墓主实际上是个巫医,同时也是这个族群的政治领袖,而非纯粹是一位巫师。他丰富而珍贵的随葬品,像货贝、玛瑙、绿松石、金耳环、木柄铜斧等可以说明其身份尊贵。而据考古材料可以看出,他曾接受开颅手术,其头骨上的开孔呈圆形或者椭圆形,均在颞骨、额骨处,系人为所

致。这种穿孔现象可能是其他巫医所为,穿孔的工具便是其口袋中的铜锥和铜刀。铜刀用以刮开头骨上的皮肉,铜锥则用来钻孔。墓中出土的大麻成分在当时的手术中广泛用于麻醉,木盆的作用则相当于中医中的药臼。这些物品是作为死者生前物品一并葬入的。至于木柄铜斧和系有铁片的木棍,则多少意在宣示权势和尊荣。在早期铁器时代,铁作为一种贵金属,较青铜器具锋利,恐怕非一般百姓所能使用,可能即死者的权杖(兼神杖),木柄铜斧则象征其军政权力。这其实同埃及法老图坦卡蒙的权杖相似,作用也相仿。

#### 参考文献:

- [1]李肖,吕恩国,张永兵.新疆鄯善洋海墓地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2011(1).
- [2]王炳华.新疆阿拉沟竖穴木椁墓发掘简报[J].文物,1981(1).
- [3]张学文,张家宝.新疆气象手册[M].北京:气象出版社,2006:166.
- [4]王欣.鄯善苏贝希遗址与早期车师文化[M]//西北民族论丛:第4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84.
- [5]李肖,张永兵,张振峰.新疆吐鲁番地区交河故城沟西墓地康氏家族墓[J].考古,2006(12):15-16.
- [6]蒋洪恩.吐鲁番洋海墓地植物遗存与古洋海人及环境之间的关系[D].北京: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植物研究所),2006.
- [7]南香红.罗布泊,小河墓地惊世再现[N].南方周末,2004-09-09.
- [8]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新疆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214.
- [9]彼得·丹斯.贝壳[M].猫头鹰出版社,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5:69.
- [10]陈健文.论中国与古代南西伯利亚间的文化互动[M]//张广达先生八十华诞祝寿论文集.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0:921-964.
- [11]李晓青,南宝生.甘肃清水县刘坪近年发现的北方系青铜器及金饰片[J].文物,2003(7):10-12.
- [12]孙新周.岩画·鹿石·嬴秦民族寻根[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7(4):36.
- [13]叶瑶.新疆考古发现的头骨穿孔现象[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2:49.

